

1989.3.25

綏濱文史資料

第三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綏濱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1989年3月

责 任 编 辑： 李佳才

封面篆书设计： 刘振坤

绥 滨 文 史 资 料
第三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绥滨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9年3月出版

印数：500册 字数：60301

目 录

- 一、从山东到东北 齐奉泉 (1)
- 二、日伪时期的绥滨政局
与剿匪斗争 赵海瀛 (70)
- 三、铁镣锁不住爱国心 刘忠民 (118)
- 四、对绥滨土改工作的回忆 刘好义 (141)
- 五、为妇女解放而斗争
的岁月 孟玉芹 (148)
- 六、建国前绥滨县中医药
概况 张相会 王美雪 (156)
- 七、地方宗教活动 怀 乡 (163)
- 八、小资料
 - 1、中兴镇 (171)
 - 2、绥滨县社会治安
与经济概况 (173)
 - 3、民国时绥滨县概况 (180)

- 4、三江省绥滨县
 人口增加数 (183)
- 5、绥滨县国民优级学校 (184)
- 6 绥滨县国民学校 (185)
- 7 绥滨县国民义塾 (186)
- 8、绥滨县水害状况 (187)

从 山 东 到 东 北

——回忆合江军区老五团的战斗历程

亓 导 泉

渡 海 出 关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八月十四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历史性的胜利！

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我党所领导的原东北军驻山东部队，由万毅同志率领向东北进军。这支部队原是张学良将军领导的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调到山东坚持敌后抗战。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该军一一一师宣布起义，原来我党在东北军工作的

党员陆续又回到这支部队，党组织还从各地抽调干部充实这支队伍。我是一九四三年从山东“抗大”被派到这支部队的，开始在六六六团机炮连任指导员。那时我才二十二岁。与我一起从“抗大”到这支部队的有张玉楷和苏成高同志，他们也都分别到连队担任干部。部队起义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曾进行过阶级教育，发展党的组织。我们团的团员彭景文同志，就是起义后发展入党的党员。

一九四四年，一一一师改编为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正式宣布为我党直接领导的军队，万毅同志是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支队司令员。王维屏（王振乾）同志任支队政治委员。管松涛同志任参谋长，李欣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该年我被调到支队政治部任特派员。部队进军东北前，在万毅、梁兴初同志指挥下，攻打日伪盘踞的胶县，消灭了伪军三千多人，缴获敌人大量武

器、装备。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队伍在胶县、诸城边界进行整编。以滨海支队为基础，成立挺进纵队，万毅同志任纵队司令，王振乾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部队从山东诸城出发，到达胶东，这时上级从胶东和鲁中各抽调一个营组成挺进纵队第二支队，滨海支队为第一支队。彭景文同志为一支队司令员，李欣同志为政治委员，管松涛同志任参谋长（后调二支队任司令员）张翼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下率三个团，即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团。向东北进军。

离开山东、告别乡亲，每个人的心情各有不同。对于许多家乡在东北的同志，能够回到沦亡多年的故土，内心有着不可言喻的激动；对于我们许多在山东土生土长的青年人，却有着另一种复杂的感情。但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在激励着我们，那就是：占领东北，扩大武装。

建立人民政权！

队伍从山东黄县兰家口上船，经过一昼夜的航行，到达辽南兴城葫芦岛。万毅同志已提前带领二十六团四连作为先头连队，携带电台在菊花岛登陆。过海以后，部队驻扎兴城。乘火车开赴沈阳马三家子车站，接着行军到平罗铺集合。第二天，李欣同志告诉我，组织上决定抽调二十六团三连连长邵洪泽同志和我二人，组成一个营的架子，由邵洪泽同志任营长，我任教导员，并把先头连四连交给我们，开赴北满。

在我离开政治部之前，山东军区肖华同志到我们部队视察，并对部队指战员发表讲话，使我们对当时全国的形势和东北的形势以及我们的任务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讲话是激励人心的。当我见到肖华同志一人独自行动，出于对他的崇敬和安全的担心，还特地为他派了二

名警卫员。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也很有干劲，只希望上级尽快下命令。说干就干，说走就走；占领东北，扩大武装！

离开沈阳之前，东北局领导调三支队参谋长孙光（孙靖宇）为进军北满三江地区部队司令员。原抗联军长戴洪宾为副司令员，负责带领我们上北满。按照孙靖宇司令员的指示，邵洪泽同志和我带四连先到沈阳东的东山咀子火车站乘火车，孙靖宇还对我说：“到车站后，那里还有队伍等候，你们一起乘车上北满”。我回到连队与洪泽同志商量后，连夜对连队进行组织动员，一直忙到翌日二时，队伍才出发。

当时苏联红军已经占领沈阳，东北局在彭真同志领导下，已在沈阳进行工作，由于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条约”，苏军不让我们部队进城。所以我们只能绕着沈阳外围走。从平罗铺到东山咀子车站，足足走了十几个小

时。连队当天下午四时才到达目的地。

二十六团四连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全连一百多人，大部分同志都是抗战时期的老兵。因为我们准备到东北接收武装，所以在离开山东时，武器都留给当地的部队，全连只带十来支枪，战士们一天行军，中午还未吃饭，大家情绪还是很高，队伍一到车站，营长邵洪泽同志带四连连长雷清阳和事务长金吉庆去号房子；我则带着通讯员王正森和姓王的粗通俄语的“翻译”去看地形，因为我看到在不远的山坡处有苏联红军的哨所，心想碰到苏联军也可取得联络。在我走离车站约二百米的一条沟边，突然窜出未三个带匣子枪的人，举枪对着我们喊：“不要动”！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的队伍，就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其中一个说：“误会、误会”！只见一个带头的满脸麻子，语气粗暴地说：“跟我们走”！我心想可能不

是我们的人。当时我们三个人只我身上带着一支小手枪，有三发子弹。他们把我的手枪收了。听说要跟他们走，我暗自打算着走到车站，我们人多，可以把他们抓起来。一往回走，我发现连队也被他们围住并缴了枪。我才意识到事情严重。他们把我押到离车站不远的东大营，我见到邵洪泽同志也被几个敌人押回来，为了不暴露我们队伍干部的情况，我自称是这个连队的连长，敌人把我单独押到另一个房子里，把邵洪泽同志和四连战士关到一个大礼堂中去。我进到一个房子里见到支队两名侦察员也关在里面，他们一见我进屋就站起来想和我说话，我故意抢先问两名侦察员：“你们是那一部份的？”他们一听我口气的说，都不开口了。趁着敌人卫兵离开，我才问明两个侦察员的情况，原来是支队已经发现这股敌人有二千多人，逃窜到东山咀子，派侦察员通知我们连

队，先不要到这个地方来，信中还提到上级正与苏联红军联系，准备把这股敌人缴械，因为侦察员被捕，所以敌人对我们的行动已经知道了。我应及时对两名侦察员说：“你们不必害怕，我们的部队会来收拾他们的”。这时我把公文包里的几份并不很紧要的文件压到炕席底下，把一张写着连队干部名单和党员名单的小纸条吃到肚子里，心想着对付敌人的办法。不久敌人来了一个参谋长，找我了解情况，问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只说我们就是到这个地方来。军人就是服从命令，上级叫往哪就往哪！他们问不出什么名堂，就说这是误会了，我说既然是误会，我要见见自己连队。他们把我带到礼堂中，我一进去就对全连同志说“弟兄们，我这个连长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今天落到敌人手里了，你们都是久经考验的战士，我们要同生死共患难，大家不必害怕……”，话未说

完，故参谋长就不让我说下去，我们就吵了起来。连队战士见状，纷纷蜂拥起来和敌人争吵。敌人把机枪都架到屋頂上，他们见不是势头，就把我带走，到了小房子里，就把我縛了起来。第二天清晨，苏联红军出动飞机、坦克，和我们的部队一起包围了这股敌人，迫使敌人缴械。这样，我和连队才被解救出来。

日本投降后的东北，苏联红军控制着各主要城市，国民党主力部队还在缅滇线上未能赶到东北来，而在日本占领时期的一些伪军、土匪、国民党被俘军官，在日本投降后纷纷拉起队伍，自立旗号，我们在东山咀子碰到的就是这样一支杂牌军。在当时我们部队抢先到达东北，并当我们与苏联红军取得联系后，他们的处境已是危危可岌，行动上也为惊弓之鸟。他们把我们连队包围并缴了枪，但又不敢残暴的处置我们，而这时：已在沈阳的东北局领导

彭真同志也都得知我们连队落难的消息，正在采取措施解救我们的连队。当时彭真同志在东北局驻地（现沈阳博物馆）对我山东来的同志讲话中，要求我们的同志到东北以后要像种子一样，撒到那里就在那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彭真同志还特别提到我们这个落难的连队，并告慰大家不必担心，东北局正与苏军联系设法解救。后来我们知到这些情况，心情非常激动。

我们被解救出来后，我马上通知大家去收枪，全连同志已经两夜没有睡觉，饭也没有吃，大家还是争先恐后的去拿枪，开始拿的枪五花八门，后来听说仓库里有新枪，大家把旧枪扔了，又换了新枪，场面极为热烈。第二天，我集合队伍，对可以发生的事情，向全连同志讲了话，对在与敌人斗争中表现勇敢的同志进行了表扬。当时四连一个班长叫杜胜，抗

战时期曾是山东军区战斗英雄，到沈阳时只十九岁，在和敌人争吵中表现很勇敢，敌参谋长问他：“你那年参加的八路？”杜说：“当了十几年了”。敌参谋长气急败坏地踢了他一脚。接着又问四连文书王广泰：“你为什么没穿皮鞋？”王说：“我没叫日本人干爸爸，就没穿皮鞋！”这家伙又狠狠地踢他一脚。我们的战士在敌人面前的勇敢气节和对敌人的蔑视的表现，使敌人狼狈不堪。

东山咀子发生的这一事件，上级领导经过调查，证实了我们当时的勇敢表现，司令员孙靖宇对我说：“没有什么事，你们表现很好！”虽然这是一个挫折，但却是一次考验，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战士对敌人的勇敢无畏。对革命的无限忠贞，使我对带领这样一支队伍，增强了无限信心。

进军东北中这一段小小插曲，想不到二十

多年后却成为我一生中的一次灾难。在“十年浩劫”中，一些“造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夺权的需要，不惜采用一切卑劣手段，企图把我打成“大叛徒。”他们对我进行严刑逼供，惨酷摧残。把我打得死去活来。在严酷的战争年月里，没有死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枪弹下的人，却差点在“十年动乱”中被自己人整死！

在沈阳装备了连队，上级又给我们营补充两个新兵连，编为五营、六营，并派刘德和同志来担任副营长、于洪典同志任副教导员。这时我营的编制是：

营 长：邵洪泽

教 导 员：亓导泉

副 营 长：刘德和

副 教 导 员：于洪典

营 书 记：鲍昌一

营 管理 员：孙振江

四 连 连 长：雷德阳

副 指 导 员：王克芳

副 连 长：李树栋

五连连长：许长明 指导员：张兴茂

副连长：刘纪修

六连连长：丁锡昌 指导员：李若林

副指导员：葛成云

在沈阳停留期间，从山东胶东来的几十名干部，其中一部分同志为杨象山、马仲、张恩前、滕高亭、尤兰亭、于江、王建秋、于长青、姜玉、王智信、黎军（女）等都在司令部。李孟义、刘德和、于洪典、葛成云、李洪伦、鲍昌一、王永之、金志忠、张力钧、白天坦、孙振江等同志到我们营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这时队伍全副武装，每班配备轻机枪一挺，全营还携带九二式重机枪两挺。八二迫击炮两门，并有一些掷弹筒和多余步枪五百多支，枪多弹足。在孙靖宇、戴洪宾的带领下，由一苏军少校陪同，乘火车开赴北满三江。